



## 华夏文明传播研究

——主持人：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谢清果

### 主持人按语（第二期）

华夏文明传播研究是建构华夏传播学的重要领域，即从文明传播的角度探讨华夏文明绵延五千年的传播奥秘。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够传承五千年，是因为中华民族较早地形成了共生的理念和行为范式。共生理念体系一方面追求“生生”，探讨万事万物所以能够发生发展、充满生机活动的原因，即背后都有“道”，也就是说，都遵循着固有的秩序与原理，不共生，则必共亡。另一方面，中国人以自己早熟的智慧，形成了“配天”的行为范式，认为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以人配天，即人配合天的运行，顺应天道的法则建构人道的秩序，从而达到天人和谐，进而规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己的身心和谐。一种文明如果不在传播中崛起，便在传播中消亡。传播彰显文明的智慧与力量，文明锚定了传播的方向与路径。换言之，传播应当循着天道的光明与人道的仁慈的方向发展，不断调适自己，将共在、共情、共生作为自己生存的理念，从而在维护自己“生”的同时，也保护了他者的“生”，并且在与他者互动中，丰富发展了自己“生”的境界与能力。华夏文明传播研究就是在站在人类共生交往的宏大叙事中，观照人类当下与未来的发展，提出文明传播的应有原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传播学方案。

基于这样的理想信念，我们创办了这个专栏。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华诞，我对华夏传播研究与新中国共奋进的40载光辉历程进行了适时梳理，本期首篇文章《华夏传播研究的初心、求索及其方向》就是我撰写的六万余字《华夏传播研究七十年研究报告》中的一小部分内容（总体报告争取在明后年扩充成《华夏传播研究学术史》一书）。本篇是总体报告的核心与灵魂所在，也就是说，《华夏传播研究的初心、求索及其方向》一文实为整篇报告定调，点出了华夏传播研究的初心是坚持中华文化立场，方向

是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力量的“华夏传播学”，而求索的过程则是以我为主，综合创新，以西方传播学为镜鉴，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为切入点，以阐释华夏文明发生发展的传播原则为核心目标，以为人类和平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为远大目标。核心目标与远大目标其实是二而一的，因为能够说明华夏文明何来何往，解释华夏文明的共生特质，实质上也就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中国方案”。

张兵娟、张议丹的《历史文物的影像叙事与文化认同建构——以〈我有传家宝〉为例》一文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推出的文化收藏类节目《我有传家宝》为例，探索这个节目的内涵、运作模式和影像叙事的创新手法。文章认为这个节目以历史文物为媒介传播礼文化，通过建构积极有效的谈话场，设置趣味环节，运用多视听手段等叙事策略，营造了轻松活泼与古风古韵并存的叙事风格，激活了观众的文化记忆，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促进了文化认同的建构。

钟海连与蒋银的《贤文化组织传播与“尚贤”治理建构：基于理念与实证的研究》（上）一文创造性地提出“贤文化组织传播”这一新观念，试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为圣贤”的道统学脉在当代的组织传播实践中予以贯彻落实，这种古为今用的致用精神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优势所在。贤文化在修身治国方面的突出表现，已为历史与现实所证明，进一步梳理贤文化的内涵及其与当代实践的勾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本文（上）细致梳理了儒、墨、道、法等主要学派对贤文化的认识。

万丽萍、罗兵的《民俗符号的意义建构与传播策略》一文从如何维护民俗文化遗产，巩固民俗所承载的民众共同意义空间的问题意识出发，着力探讨民俗符号的意义建构模式，指出民俗符号意义建构应当遵循“感知→认知→认同→

情感记忆”路径，并提出了相应的传播策略——通过体验加强受众对符号的感知，通过诠释促进受众对符号意义的理解，通过故事叙述提高对符号的记忆，通过文化认同巩固符号意义体系。如此，方可促进公众建构共有的意义系统和文化体系，进而传承民族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田素美的《山地旅游背景下贵州民族文化开发与传播研究》一文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探讨如何保护性开发民族文化资源问题，作者怀有深切的人文情怀，实证分析了民族文化开发中出现的异化问题，进而探讨如何合理保护、传承民族文化，正确传播民族文化，塑造良好的民族形象等传播问题，引人深思。

王臻的《言—象—意—道：媒介事件中的国家形象符号学分析》一文借助源于老庄、易经之论的DIMIT模式，即以言（Discourse）、象（Image）、意（Meaning）、道（Tao）四者互动关系为基础的东方符号学表述，来分析媒介事

件中的国家形象问题，并以G20杭州峰会中媒介建构的杭州形象所传达的中国形象为案例，深入地分析基于这一模式的传播效果。文章视角新颖，见解富有启发。

本期文章既有宏观层面对华夏传播学方向的把握，又有中观层面对贤文化组织传播的考察，更有微观层面对文化认同建构，民俗符号传播的意义建构，国家形象传播“DIMIT模型”的传播效果和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等问题的思考与考察。这些论文或运用理论关照现实，或因应了现实对文化传播的呼唤，彰显了中华文化传播的独特魅力，由此可知，中华文化传播事业应当是可信，可爱，可行的。

（注：本专栏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华夏文明传播的观念基础、理论体系与当代实践研究”（19BXW056）阶段性成果的重要展示平台。）